



四川大学出版社

朱全福 著

《金瓶梅》与明代中后期的社会思潮研究

◎《金瓶梅》与明代中后期的社会政治思潮

◎《金瓶梅》与明代中后期的商业文化思潮

◎《金瓶梅》与明代中后期的社会风气的蜕变

◎《金瓶梅》与明代中后期的社会文化思潮

◎《金瓶梅》与明代中后期的社会风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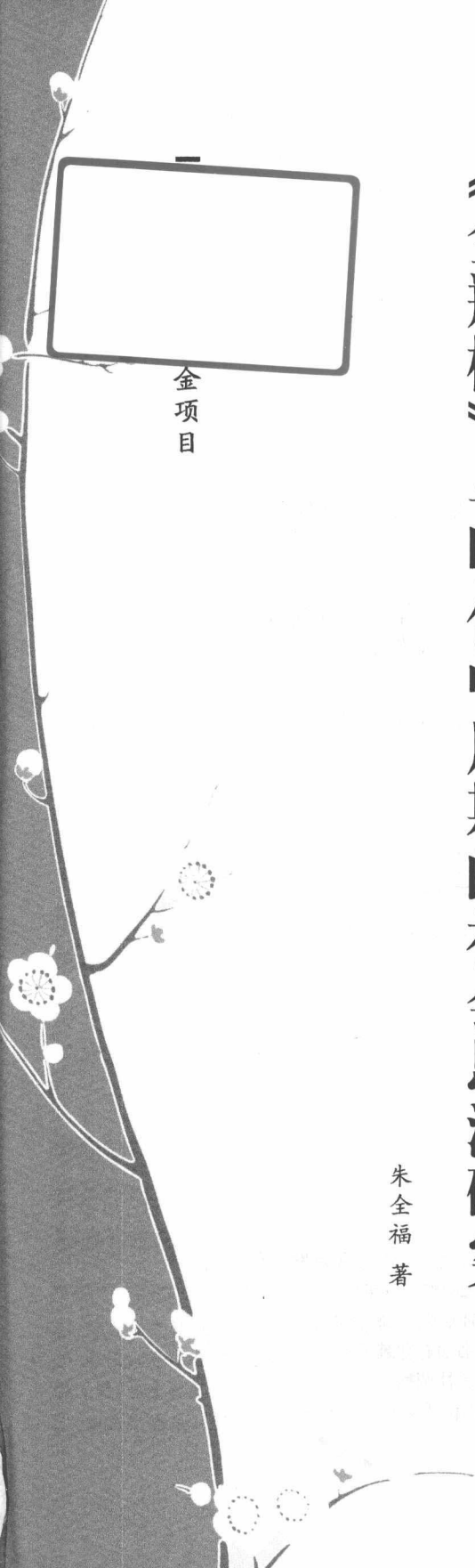


四川大学出版社

《金瓶梅》与明代中后期的社会思潮研究

朱全福 著

金项目



责任编辑:楼 晓
责任校对:欧风偃
封面设计:天一文化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瓶梅》与明代中后期的社会思潮研究 / 朱全福
著.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6. 1
ISBN 978-7-5614-9298-7

I. ①金… II. ①朱… III. ①《金瓶梅》—小说研究
②社会思潮—研究—中国—明代 IV. ①I207.419
②D092.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24741 号

书名 《金瓶梅》与明代中后期的社会思潮研究

JINPINGMEI YU MINGDAI ZHONGHOUQI DE SHEHUI SICHAO YANJIU

著 者	朱全福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9298-7
印 刷	郑州宏达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mm×240 mm
印 张	22
字 数	361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6.00 元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http://www.scupress.net>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东吴弄珠客在《金瓶梅序》中说：“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①自《金瓶梅》问世至今几百年来，无数的文人墨客、专家学者对此书发表的观点、看法和评论可谓浩如烟海、汗牛充栋，难以数计，并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人作为《金瓶梅》的一个阅读者和研究者，在对此书进行认真、反复的品读后，自然而然地也产生了自己的一些阅读心得和体会，于是通过“《金瓶梅》与明代中后期社会文化思潮”这一研究课题切入，就此进行一番梳理和探讨。不当之处，敬请大方之家批评指正。

《金瓶梅》作为中国古代“人情小说”的开山之作，它的杰出之处不仅仅是在故事情节的编排、人物形象的刻画及艺术构思的缜密上超乎寻常，更在于它对世态人情的描摹和展示，“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②，因此要对《金瓶梅》的写作主旨及表现内容上“独罪财色”^③的特色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和把握，就应该把它放到明代中后期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加以全面的考察和鉴别，只有这样才能感悟“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④这段话的真切含义，从而对小说有更深刻的理解和领悟。

有鉴于此，本论著从以下五个方面加以展开，即：“《金瓶梅》与明代中后期的社会政治思潮”“《金瓶梅》与明代中后期的商业文化思潮”“《金瓶梅》与明代中后期社会风气的蜕变”“《金瓶梅》与明代中后期的社会文化思潮”和“《金瓶梅》与明代中后期逾礼越制的社会风尚”。这五个方面既相互联系又具有各自的特性。

① 陶慕宁校注：《金瓶梅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 页。

② 鲁迅：《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80 页。

③ [明]兰陵笑笑生著，[清]张竹坡评：《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齐鲁书社 1987 年版，第 9 页。

④ 陶慕宁校注：《金瓶梅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 页。

从明代正德时期开始,中国历史进入了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个时代能比这一时期更具诱惑力了。这是一个近乎疯狂、杂乱而人欲横流的时代。明王朝从正德皇帝开始,历经嘉靖、隆庆到万历皇帝时期,政治上急剧走向衰落。由于皇帝的昏庸荒诞、慵懒怠政,国是日非,以致佞幸擅权、内阁纷争,上为结党营私,下则夤缘钻刺,吏治败坏,贪污成风,君荒臣纵,纲纪日坏。统治集团过着越来越荒淫无度的生活,导致政治黑暗,风俗颓败,社会危机日趋严重,明王朝呈江河日下的衰败之势。这就导致了社会危机的频发和变革思潮的涌动,尤其是社会文化思潮的革新风起云涌,也使得《金瓶梅》中惩淫色、戒四贪的描写有了现实的指向。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明代中后期社会文化思潮的兴起,是与当时社会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商业的兴盛,人们经济地位的提高、经济收入的增长,以及由此导致的商业文化思潮的掀起和在此思潮影响下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的变化密切相关的。《金瓶梅》的主角西门庆一生的发迹,始终是以经商获取金钱作资本的。西门庆虽然集恶霸、富商、官僚三位于一体,然而在本质上他首先是个商人,他精明干练,谙熟经商之道,再加上偷奸耍滑、官商勾结、巧取豪夺等手段的使用,使他在封建时代的商海中左右逢源、游刃有余。他的经商赢利也为他满足个人及其妻妾穷奢极侈的荒淫生活提供了物质保障。而《金瓶梅》中描述的百业兴旺的景象同样是明代中后期商业兴盛的真实写照。

“物质生活的丰富给人们的追求提供了基本条件,作为文化先导的文人士大夫,首先是拥有财富和权势的士大夫们,将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都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人们的社会观念开始发生了变化。”^①正是人们在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上的变化,导致明代中后期的社会风气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金瓶梅》的描写来看,主要表现为:道德沦丧,世情浇漓;婚姻轻视门第,重财求利;奢华享乐之风盛行等几个方面。

明代中后期,封建经济内部正孕育着新的经济因素,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商人和商业资本开始蠢蠢欲动。金钱的力量冲决了卑尊贱贵的束缚、纲常礼教的堤防,有力地改变了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人欲的觉醒和张扬,猛烈地撕扯着封建礼法道德的理性网络,宋明理学失去了教化人心的作用。于是一股富有生命力的异端思潮涌动于中晚明社会。王阳明、王畿、王艮、李贽、焦竑、颜钧、罗汝芳、何

① 商传:《明代文化史》,东方出版中心 2007 年版,第 16 页。

心隐等思想家把程朱理学作为主攻对象,围绕“心之本体”,对性、欲、情等范畴作了多方面的探讨。以人为本位,肯定人性人情,独尊人在天地间的地位,形成了尊情抑礼、主情反理的文化思潮,并且在理论上实实在在地解决了圣人和个人的关系,使明代中后期的思想解放思潮成为客观的现实。

《金瓶梅》对明代中后期这股尊情抑礼、主情反理的社会文化思潮给予了正面的回应。在小说中,不仅各级官僚竞奢比侈,荒淫无度,追求物质生活和感官生活的享乐,就是一般市井细民,也往往表现出一种区别于小农经济制约下的风俗习尚和道德评判。他们追求的是今世的享乐,传统的礼仪、秩序、名誉、贞节等观念,统统被置于不屑一顾的地位。这种局面的出现,正是晚明社会思潮和文艺思潮所引发的人的觉醒的必然结果。

于是,受晚明社会追求物质生活和感官生活的享乐、纵欲思潮的影响,一部《金瓶梅》在“财”“色”两字上做足了文章,极尽铺张、渲染之笔墨,将晚明时代五光十色的生活进行了活色生香的展示。

明代中后期,士庶民众的生活风貌较之前有了很大变化,他们不再遵循以往的规矩与成例,而是纵情适性,张扬自我,尤其在衣食住行等方面追求奢靡华贵,夸富斗艳,以至于逾礼越制的现象司空见惯,几成家常便饭。而这一切的发生,同样与晚明人文主义思潮所提倡的“尊生贵人”思想的发扬、自我意识的觉醒,对个性自由的憧憬、对人的情欲的肯定、对人间幸福快乐的追求密不可分。因此,才有《金瓶梅》中各色人物在服饰装扮、饮食消费以及房舍、出行上动辄逾礼越制的种种行为表现。小说常常通过浓墨重彩、穷形尽相的描绘,再现了晚明时代的世相,为广大读者编织了一幅色彩斑斓的晚明社会生活的画卷。所以张竹坡认为“《金瓶梅》是一部《史记》”,绝不是凭空妄语,而是切中肯綮之言。

众所周知,《金瓶梅》一书以北宋末年为背景,表面上写的是北宋末年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而实际上呈现的却是明代中后期一幅色彩斑斓的社会生活画卷。它以小说艺术的形式将当朝的人物和事件加以虚构、渲染和润色,因此其所描绘的社会面貌、所表现的思想倾向,有着鲜明的晚明时代的特征。这正如郑振铎所指出的那样:《金瓶梅》“是一部很伟大的写实小说,赤裸裸的毫无忌惮的表现着中国社会的病态,表现着‘世纪末’的最荒唐的一个堕落的社会景象”^①。

① 胡文彬、张庆善选编:《论金瓶梅》,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50页。

关于《金瓶梅》这种穿越宋代实写明代的创作手法，早在《金瓶梅》一书流行之初，当时的一批文人墨客就已看出其中的端倪，并敏锐地嗅出了它的政治讽喻性。如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认为这是一部“指斥时事”之书，而最早透露《金瓶梅》一书信息的袁宏道则在给大名鼎鼎的董其昌写的信中说：“《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①众所周知，《七发》是汉代辞赋大家枚乘所写的一篇讽喻性的作品，赋中假托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去探望，借吴客之口，分析了楚太子患病是缘于贪逸享乐、荒淫奢侈的宫廷生活，进而指出这种病非药灸所能治，唯有“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由此可看出作品是针对“楚太子”一类统治者“久耽安乐，日夜无极”，乃至“久执不废，大命乃倾”的情形而发出的讽谏。《金瓶梅词话》欣欣子序的结尾处也说：“笑笑生作此传者，盖有所谓也。”而廿公跋语一开头就指出《金瓶梅》：“盖有所刺也。”看来，万历年间第一批阅读到《金瓶梅》的文人学者们心里大都明白，《金瓶梅》并不只是一部虚构的小说，还是一部抒写时事、具有强烈现实针对性的政治讽喻之作。

① [明]袁宏道：《锦帆集·与董思白书》。

绪 论|001

第一章 《金瓶梅》与明代中后期的社会政治思潮|017

《金瓶梅》所反映的明代中后期的社会政治思潮，从总体上而言表现为：明王朝从正德皇帝开始，历经嘉靖、隆庆到万历皇帝时期，政治上急剧走向衰落。由于皇帝的昏庸荒诞、慵懒怠政，国是日非，以致佞幸擅权，内阁纷争，上为结党营私，下则夤缘钻刺。

第一节 《金瓶梅》与明代中后期皇帝的昏庸荒诞、荒淫无道|019

第二节 《金瓶梅》与明代中后期官场的腐败、权钱交易|028

第三节 《金瓶梅》对明代中后期司法不公、枉法渎职的暴露|036

第二章 《金瓶梅》与明代中后期的商业文化思潮|043

《金瓶梅》成书的嘉靖、万历年间，一方面政治形势日趋腐败、险恶；另一方面社会生活丰富多彩，思想观念急剧变化，经济活动十分兴盛，商业贸易迅速发展。新旧观念正在进行着激烈的冲突和碰撞，而社会文化思潮也呈现出大裂变的趋势。

第一节 “恤商”“重商”的商业文化思潮|045

第二节 商人地位的显著提升|053

第三节 商人形象呼之欲出|068

第三章 《金瓶梅》与明代中后期社会风气的蜕变|075

商业经济的繁荣和价值观念的变化，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传统“四民”界线的日渐模糊，再加上封建王朝政治统治力的日渐减弱，导致了明代中后期社会风气的巨大变化。

- 第一节 道德沦丧，世情浇漓|077
- 第二节 婚姻轻视门第，重财求利|086
- 第三节 奢华享乐之风盛行|091

第四章 《金瓶梅》与明代中后期的社会文化思潮|123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根据明初的社会现实，推行程朱理学，同时采取严刑峻法、惩贪治恶的严酷措施，对人们的思想禁锢较为严重；正德、嘉靖以后，随着政治统治的松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壮大，人们的思想不再囿于传统的儒家之道。

- 第一节 明代社会文化思潮及其演变|125
- 第二节 明代中后期文学思潮的演进|142
- 第三节 《金瓶梅》与晚明文学思潮|152

第五章 《金瓶梅》与明代中后期逾礼越制的社会风尚|253

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的表现。一部文学作品所描写的内容和传达的思想往往是与作者所处的时代的特点、社会思潮的影响等因素分不开的。明朝自正德年间开始，商品经济日益发达，市民阶层壮大，朱学衰落而王学盛行，传统观念受到猛烈的冲击，社会思潮的主流嬗变为反传统、重个性、尚人欲、讲奢华。

- 第一节 僭越礼制的衣冠服饰|257
- 第二节 奢靡越制的饮食风尚|285
- 第三节 逾越等级规制的住与行|315

参考文献|335

后 记|343

被誉为明代“四大奇书”之一的《金瓶梅》在十六世纪末问世,如惊雷乍起,誉之毁之,莫衷一是。然于聚讼纷纭之时,有志于研究者毕竟寥寥无几,不成气候。直到二十世纪以后,学术界对《金瓶梅》的研究,随着人们的学术观念从古代向现代的转型,随着小说价值观念的变革与更新,渐次由微而宏,由浅而深,遂成显学,学术界称之为“金学”,它几乎可与中国小说研究的另一显学——“红学”并驾齐驱。

“百年金学”研究大潮中涌现出了一大批“金学”研究专家和学者,也产生了数量惊人的研究成果,我们在此不妨进行一番梳理和回顾。

一、传统的《金瓶梅》研究主要围绕着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 关于小说作者

《金瓶梅》的作者是谁?兰陵笑笑生是谁?至今仍是一个不解之谜。《金瓶梅》一问世,作者问题便成为众说纷纭的话题。除王世贞、李开先、贾三近、屠隆外,走进《金瓶梅》作者候选人队伍的还有沈德符、冯梦龙、袁无涯、谢榛、李先芳、刘修亭、陶望龄、冯惟敏、邱志充、汪道昆、王稚登、丁惟宁、汤显祖等。

2. 关于小说的成书年代和版本

《金瓶梅》的成书年代大致有“嘉靖说”和“万历说”两种,而且各执一词,至今无法定论。《金瓶梅》曾先后出现过三种不同的版本系列:一是早期的几个抄本。可惜的是除了在明代一些学者的通信或笔记中有所记载外,这些早期的抄本并没有流传下来;二是词话本,即明万历年间刊刻的《金瓶梅词话》。目前,存世的已发现了三部,除一部辗转美国而今藏于我国台湾外,另外两部均流落到日本;三是明崇祯年间刊刻的多达七八种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及之后的《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等说散本。

3. 关于小说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倾向的评价

对如何评价《金瓶梅》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历来都有很大的争议。大多数

研究者一般都对《金瓶梅》的评价较高,肯定了它的现实主义成就,同时又指出它本身存在着严重的自然主义倾向,即露骨的“性描写”,认为它“大肆地渲染偷奸淫乱的细节”,是其不足之处,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当然现今已经很少有人再把《金瓶梅》当作是一部“淫书”看待了。

性描写之争是二十世纪百年金学中争论之焦点,论争激烈,且各执一词。

有些学者主张《金瓶梅》中的性描写是内在的、有机的、不可或缺的。早期对《金瓶梅》性描写予以一定积极评价的论著多从其“史料价值”着眼。二十世纪中叶之后,才逐渐转入更为内在、深入的研究,代表作有日本后藤基已的《〈金瓶梅〉的时代背景》、章培恒的《论〈金瓶梅词话〉》、王彪的《作为叙述视角与叙述动力的性描写——〈金瓶梅〉性描写的叙事功能及审美评价》等。前两篇文章重在从体现晚明人性解放新的时代精神的视角对《金瓶梅》的性描写予以充分肯定,王彪的文章则就《金瓶梅》性描写与小说叙述视角和动力的内在关系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认为性描写无法从《金瓶梅》中剥离,性描写除了表现主题思想和人物形象需要外,在《金瓶梅》里还具有一种独特的形式功能,这种功能使“秽笔”真正渗透到全书的肌体,直至成为血肉本身。具体地说,一是性描写作为《金瓶梅》的叙述视角之于体现小说主题的意义;二是性描写作为《金瓶梅》的叙述动力之于推进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发展的意义。与以上意见相左的另一些学者则认为《金瓶梅》中的性描写是外在的、附加的,至少是过度的,故删除之也无伤大体。虽然他们也并不全盘否认《金瓶梅》性描写的价值,但认为这些性描写没有节制过于泛滥,是书中的败笔,于社会于读者有害无益。徐朔方在《论〈金瓶梅〉的性描写》一文中这样写道:“不是闪闪发光的东西都是金子。性描写并不必然等同于个性解放,正如同杂乱的性关系并不必然就是封建婚姻制度的叛逆。”这一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

4. 人物形象评价

主要是围绕西门庆、潘金莲以及其他人物形象的评价而展开。

对西门庆这一人物形象的评价学术界主要有过三次争论。一是西门庆的社会属性中是否含有地主成分?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把西门庆称为地主、恶霸、商人三者的混合体。另一种意见认为,西门庆虽购买土地,但未进行土地投资,故认定其为地主缺乏起码依据。二是西门庆之属性层次是三位一体,还是以商为主的官商?近年来,将其作为官商典型的意见较引人注目。三是西门庆是否是新兴商人?自卢兴基提出“新兴商人说”后,认为西门庆是新兴商人的观点遭到多位学者的强有力反驳。西门庆形象论争的结果是使这一形象的社会属性更加明确,

西门庆既不是地主,也非新兴商人,而是一旧式官商。

关于潘金莲的评价经过了一个从简单定性到全面艺术分析的过程,前期研究者如李西成、朱星等认为:潘金莲是封建社会中堕落成性却又凶狠的妇女典型,是坏女人。后期研究者如罗德荣、叶桂桐、宋培宪等则更加注重对人物进行全面的审美考察,更加注重揭示潘金莲身上可憎又可悲的多重性格。

在西门庆、潘金莲两位最重要的主角之外,有关人物形象之争还涉及李瓶儿、庞春梅、宋惠莲、吴月娘等人物。比如对宋惠莲这一形象的评价,宋惠莲前后性格行为有强烈的反差,大致有三种意见:一是以孟超等为代表的批判性的意见,认为宋惠莲具有两重人格,是个不彻底的人物,不值得同情;二是以孔繁华等为代表的肯定性的意见,认为宋惠莲已完全觉醒,她是在以死向不公平的社会作抗争;三是李时人等提出的意见,这些意见则显得更有说服力,认为宋惠莲之死并非因为忠贞,而是源于严重的失败感,她终于意识到她根本不能对西门庆有多大的影响力,因而死于绝望。

5. 关于小说的创作主旨

关于《金瓶梅》的创作主旨,历来众说纷纭,没有定论。明代有“政治寓意说”“讽劝说”“复仇说”等;清代则有张竹坡的“苦孝说”。而现代则又有“暴露说”“探讨人生说”等种种提法。

6. 关于《金瓶梅》与《红楼梦》的关系

《金瓶梅》的创作对《红楼梦》的创作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这是学术界公认的事实,早在脂砚斋评点《红楼梦》的时候,就注意到这两部奇书之间的密切关系。近年来,随着红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人们开始重视对《金瓶梅》与《红楼梦》之间关系的研究。有的学者从题材的选择、情节的安排、场面的描绘、人物的塑造、语言的运用等方面,探讨了《金瓶梅》与《红楼梦》的关系。有的学者甚至认为《红楼梦》在现实主义地描写各阶层人物,特别是下层人物的日常生活上,跨出了难能可贵的一大步,但如果没有《金瓶梅》的成就作为起点,这个进步是难以实现的。还有的学者认为《金瓶梅》与《红楼梦》之间的借鉴、继承关系是多方面的、明显的。它们都是以家庭日常生活为题材,都敢于写“真的人物”,都重视细节描写的传统,都非常重视运用方言俗语,等等。

二、近年来《金瓶梅》研究的新趋势

近些年来广大研究者在《金瓶梅》前辈研究者对小说的作者、版本、成书年代、

思想内涵及在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等诸方面研究取得重大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对《金瓶梅》在经济、政治、文化、哲学、民俗、宗教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并且涌现出一大批研究成果。

当然,在这方面筚路蓝缕,开风气之先进行研究的当属鲁迅先生,他最早指出《金瓶梅》是一部“世情书”,并且加以具体阐述:“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缘西门庆故称世家,为搢绅,不惟交通权贵,即士类亦与周旋,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故就文辞与意象以观《金瓶梅》,则不外描写世情,尽其情伪,又缘衰世,万事不纲,爰发苦言,每极峻急,然亦时涉隐曲,猥黷者多。后或略其他文,专注此点,因予恶谥,谓之‘淫书’;而在当时,实亦时尚。成化时,方士李孜僧继晓已以献房中术骤贵,至嘉靖间而陶仲文以进红铅得幸于世宗,官至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少傅少保礼部尚书恭诚伯。于是颓风渐及士流,都御史盛端明布政使参议顾可学皆以进士起家,而俱借‘秋石方’致大位。瞬息显荣,世俗所企羨,侥幸者多竭智力以求奇方,世间乃渐不以纵谈闺帏方药之事为耻。风气既变,并及文林,故自方士进用以来,方药盛,妖心兴,而小说亦多神魔之谈,且每叙床第之事也。”^①

因此,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从文化学的角度来对文学文本进行研究的方法,正在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运用,并形成一股文化研究的热潮。这种研究风尚同样在《金瓶梅》的研究上方兴未艾。

学者们认为小说这种叙事性文体本来就具有很强的文化描写功能,特别是风俗描写的功能。而明清长篇小说的题材取向从《金瓶梅》开始,由王朝盛衰、江湖豪杰、神魔鬼怪转向对社会现实、市井生活的描绘,这样就使其文化学的内涵更为丰富了。比如,在《金瓶梅》中,那些风俗描写有时是情节发展中不可缺少的纽带,有时可借助它们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和命运,还有时是展现风土人情、渲染时代气氛、为人物活动创造具有时代特色和民俗情趣的典型环境,造成一种具有立体感和真实感、与人物性格相契合的人文环境。

这种对《金瓶梅》展开文化层面的研究大致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形:

第一类是对《金瓶梅》一书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作整体性的研究。代表专著有王齐洲的《四大奇书与中国大众文化》,此书从文化学的角度来审视中国古典小说,从

^① 鲁迅:《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0—183页。

大众文化的角度来对《金瓶梅》进行诠释；冯文楼的《四大奇书的文本文化学阐释》，打破学科疆界，采用不同的分析域，对古典小说作多层面的视角观照和多维度的文化解读。研究者站在当代意识的高度去反观古代的文学文本，洞察文本的文化构成，为文本的解读注入一种当下的价值关怀和诉求，培养文化的反省心态。陈东有的《金瓶梅——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断面》一书，以新颖的研究角度和多元的研究方法，揭示了《金瓶梅》产生的文化大背景：运河经济文化和商业小社会，极端化的王权专制和腐败的官僚政治，儒道佛三教合一与“异端邪说”的兴起。作者在这个文化大背景下剖析作品，让人们重新认识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等人，别开生面，既含文学研究价值，也有历史认知价值，对历来被诟病的性行为描写也有了新的评价，丰富了《金瓶梅》研究的成果。田秉锸的《金瓶梅与中国文化》一书，对《金瓶梅》的构思基点进行扫描，论述了《金瓶梅》中的人际关系、寓意层次、行为哲学，对《金瓶梅》与中国酒文化、性文化、运河文化、商妓文化等都有详尽的阐述。尹恭弘的《世情与世相》将作品放在晚明的时代文化背景下，对其与儒家文化、佛教文化、道教文化、性文化、政治文化、家庭文化、伦理文化、市井文化的关系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剖析。牛贵琥的《〈金瓶梅〉与封建文化》，作者通过对《金瓶梅》中的“淫与浪的文化批判”“利与欲的文化探讨”“封建基因的文化审视”等层面的研究，力求在封建文化中找到形成诸多《金瓶梅》现象的原因和质素。杨子华的《〈金瓶梅〉文化新解》一书，选取杭州地域文化作为基点，从民俗文化、饮食文化、游戏文化、舞蹈文化、戏剧文化、茶酒文化等多个角度对小说作品进行别样的解析，在阐释《金瓶梅》文化内涵的同时，为读者提供了一次以全新的视角来揭开《金瓶梅》一些未解之谜的途径，为读者呈现了一部不一样的《金瓶梅》。尹恭弘的《〈金瓶梅〉与晚明文化——〈金瓶梅〉作为“笑”书的文化考察》一书，将《金瓶梅》放到晚明文化大环境中作认真的考察，运用广泛的文化视野和观念，选择十几个文化问题逐步加以分析，力求寻找出《金瓶梅》作为“世情书”和“笑书”两者联系的文化中介。并且认为《金瓶梅》这部世情书，虽不是纯粹的文化小说，却包孕着十分丰富的文化含量，甚至比纯粹的文化小说更能显示文化变迁的剧烈和深刻。程良胜的《金瓶梅封建官场文化解读》一书，全书共分为四章，内容包括《金瓶梅》封建官场文化之风俗探析、《金瓶梅》封建官场文化之代表人物透视、《金瓶梅》封建官场文化之主要属性考释、《金瓶梅》封建官场文化之描写艺术性解读，对《金瓶梅》所触及的封建官场文化进行了比较全面和深入的论述。王宜庭的《红颜祸水——〈水浒传〉〈金瓶梅〉女性形象的文化思考》一书，从性别角度对《金瓶梅》中的文化进行审视。还有何香久的《金瓶梅与中国文

化》，阎增山、杨春忠所著的《金瓶梅女性文化导论》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金瓶梅》的文化内涵予以揭示。

至于单篇论文则不胜枚举，主要有王祥云《从〈金瓶梅词话〉包蕴的文化理念审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该文认为《金瓶梅词话》所反映出来的天命观、人伦观、价值观具有独特的民族文化特色，文化的差异是由不同民族社会经济结构的差异所致；罗德荣、胡如光《〈金瓶梅〉女性意识文化折光》一文，从文化层面探究妻妾争宠所反映的女性意识的社会实质及其悲剧性；张进德《理性的皈依与感性的超越——论〈金瓶梅〉的二元文化指向》，该文认为《金瓶梅》是世俗价值观念与宗法传统道德观念的特殊浑融。作者的理性指向表现为对宗法传统价值观念的皈依，而艺术描写的感性指向则表现为对作者理性思维定式的超越。王平《〈金瓶梅〉：文化裂变孕育的畸形儿》，该文认为十六世纪的明代中叶是文化发生分化与裂变的时期，在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体系中，开始外化出某些新的文化因素，这些新的文化因素与旧有的文化体系发生了矛盾和冲突，对旧有的文化体系给予了一定的冲击。但是，一方面由于旧有文化体系的强大，另一方面由于新文化因素只发生在个别的领域，因此，新旧文化力量的对比仍然是悬殊的。《金瓶梅》从内容到表现手法都受到文化分化与裂变的深刻影响而表现出畸形状态。陈东有《〈金瓶梅〉的平民文化内涵》，该文指出《金瓶梅》所展示出来的文化特征是平民文化。从经济活动上看，它是十六世纪中国运河经济文化的产物，体现出中国东部地区民众生存发展的丰富内涵；从宗教意义上看，小说生动而又十分丰富地展示了民间宗教的活动场景与信仰状态；从哲学思想上看，它以各种方式阐述了民众的人生态度，尤其是人应该如何正确处理社会的人与自然的人的关系；从政治态度上看，小说从平民百姓的视角，通过对政府官员故事讽刺性的叙述和评价，表明平民大众对政治的鲜明看法。《金瓶梅》的平民文化内涵，标志着中国小说对现实平民百姓命运的关注，成为明代社会平民文化的重要文本。

此外还有陈东有《〈金瓶梅〉文化意义刍论》，王启忠《简析〈金瓶梅〉“生殖崇拜”文化返祖现象》，王彪《无所指归的文化悲凉——论〈金瓶梅〉的思想矛盾及主题的终极指向》，吕珍珍《“本我”的发现与“自我”的觉醒——〈金瓶梅〉女性角色意识的文化审视》，周永祥《〈金瓶梅〉梦境描写的文化意蕴》，秦晶丽《从家奴形象的塑造看金瓶梅家奴文化的屈辱性》，温文认《从文化视野认识〈金瓶梅〉——再评〈金瓶梅——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断面〉》，周中明《论〈红楼梦〉与〈金瓶梅〉是两种文化》，郭学信《明代社会世态人情的裸露——〈金瓶梅〉与明代社会新思潮》，张艳萍《明代

心学与《金瓶梅》》，钟锡南《晚明社会文学思潮转型与《金瓶梅》对传统题材的突破》，肖扬砮《文化的衰落与裂变——《金瓶梅》婚姻家庭文化考察》，王伟《论《金瓶梅》的文化颠覆性》，郑颂《明代文化背景下的《金瓶梅》创作及评论》，申明秀《论《金瓶梅》的雅与俗——江南世情小说的雅俗系列研究之三》，陈辽《论《金瓶梅》和传统文化》，朱丽《《金瓶梅》的传统与反传统》，张之《面对《金瓶梅》的文化思索——《金瓶梅与中国文化》序章》，陈静宇《从《金瓶梅》看明代城市物质文化的发展》，魏艳君《从《金瓶梅》看晚明放纵习气的负面性》，王建科《中晚明文化思潮与戏曲小说的写情浪潮》，韩晓、魏明《论《金瓶梅》中雪场景的文化反讽》，巩聿信《论《金瓶梅词话》中的数术文化描写》等。另有王启忠《金瓶梅价值论》，田秉镆《《金瓶梅》人性论》，霍现俊《金瓶梅新解》，宁宗一、罗德荣《《金瓶梅》对小说美学的贡献》，以及章培恒《论《金瓶梅词话》》，等等，虽都未径直标出“文化”二字，但都不同程度地涉及文化方面的研究。

第二类是对《金瓶梅》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作专题性研究，即对小说中所涉及的各种文化类型进行带有针对性的研究。

首先是文化风俗的研究。学者们对《金瓶梅》所涉及的社会风俗文化方面的内涵进行了进一步广泛而深入的探究。这方面首开先声的是阿英作于1936年的《《金瓶梅词话》风俗考》一文。蔡国梁则在1984年结集出版了论著《金瓶梅考证与研究》，书中收集了他先后撰写的《笑话·传说·急口令——《金瓶梅》的俗文学撷拾》《宝卷在《金瓶梅》中》《《金瓶梅》的谚语歇后语集说》《魔镜·画裱·银作·雕漆·织造——《金瓶梅》反映的明代技艺》《灯市·圆社·卜筮·相面——《金瓶梅》反映的明代风习》等论文，对小说所涉及的通俗文学、明代技艺、风习等方面有专门的论述和挖掘。何良昊著的《世情儿女——《金瓶梅》与民俗文化》一书，指出商人西门庆是作者选来做典型的一个角色，小说描写的城市中一切的现象都借西门庆和他周围的人反映出来。因为这个原因，论著谈明代风俗时，往往以西门庆的家庭为例。西门庆是城市中的一个商人，有着明显市井人物的特色，他主要活动在朝廷典制之外，交往对象大多是青楼女子、城市混儿和南北商客。西门庆身上反映的风俗是一种市井风俗。

专题论文则有：朱星瑶《《金瓶梅》对女性日常生活的描写及其意义》，艾杨柳《《金瓶梅》婚恋文化透视》，（韩国）辛银美《《金瓶梅》中婚嫁礼俗的考察》，王平《明清小说婚俗描写的特征及功能——以《金瓶梅》、《醒世姻缘传》、《红楼梦》为中心》《《金瓶梅》与运河文化论略》《从《金瓶梅》的民俗与语言看其故事发生地》，陈诏《从

民俗描写看《金瓶梅》的时代背景》《〈金瓶梅〉婚丧礼仪考》，王湘华《〈金瓶梅词话〉火葬习俗考论》，谢洪欣《〈金瓶梅词话〉葬前礼俗考察》，苗菁《〈金瓶梅〉里的运河风情》，成晓辉《市井社会的风俗画——〈金瓶梅〉的社会性与现实性》，杨琳《〈金瓶梅〉民俗撷谈》，郭作飞《〈金瓶梅〉中俗语的文化蕴含与明代社会》，彭晶《〈金瓶梅〉生日描写中蕴含的民俗现象》，张瑞《论〈金瓶梅〉中的节日意象——以元宵节意象为中心》，魏远征《岁时节日在〈金瓶梅〉中的叙事意义》，张廷兴《论〈金瓶梅〉的民俗学价值》，赵菲菲《论〈金瓶梅〉用轿习俗及其文化内涵》，杨子华《〈金瓶梅〉所描写妓院里的足球游戏》，刘秉果《〈金瓶梅〉中的体育文化》，张延平《〈金瓶梅〉中的体育文化价值观透视》，张晓春《解读〈金瓶梅〉中家庭体育活动》，陈四海、阎增山《从〈金瓶梅词话〉看明代中后期市民音乐的流行及其型态》，阎世德《〈金瓶梅〉中反映的明代医药文化现象》，周颖《〈金瓶梅〉中药意象的审丑意蕴及文学史意义》等。

其次是商业文化研究，专著有邱绍雄所著的《〈金瓶梅〉与经商管理艺术》，南矩容所著的《〈金瓶梅〉与晚明社会经济》，跃进的《金瓶梅中商人形象透视》。而侯会的《食货金瓶梅：从吃饭穿衣看晚明人性》一书，从经济的角度解读《金瓶梅》中的人物性格与世情百态，为我们打开了认识小说人物的另一扇窗户。西门庆对家人的吝啬、潘金莲的人穷志不短、李瓶儿的慷慨大方、众帮闲的厚颜无耻，在金钱面前，人物的深层性格暴露无遗。论著指出《金瓶梅》书中经济信息之多，堪称中国小说之最。不但西门庆做一笔买卖、置一所宅院、收一笔贿赂、送一份厚礼等“大事”记述得价值详明，就是书中人物沽酒、裁衣、剃头、磨镜、买汗巾、称瓜子，乃至赏赐厨役、打发轿夫等细事，也都笔笔叙及，言必称价，银两的计算甚至细致到几钱几分。该论著从食货着手，漫谈《金瓶梅》中的柴钱米价、人事纠葛，以我们平日打工挣钱、养家糊口的平常心，来体谅古人、观照人生，触摸晚明市井百姓的世俗生活。从西门庆的生财与散财之道，“穷”金莲与“富”瓶儿的生死纠葛，到透过钱眼看去的众奴才与众帮闲的丑恶嘴脸，在金钱面前，一切虚伪的假饰都被揭去，赤裸裸的人性展露无遗。而西门庆受金钱与女色欲望推动的发家与毁灭之路，尤为引人遐思与深省。

论文则有蔡国梁的《〈金瓶梅〉反映的明代商业》《〈金瓶梅〉反映的明代城市经济生活》两篇论文，对小说所涉及的明代商业文化和城市经济生活有专门的论述。还有王伟《〈金瓶梅词话〉与明代商业文化》，张振国《〈金瓶梅〉中的“生意经”》，姜守鹏《〈金瓶梅〉所反映的明代商业》，邱绍雄《论〈金瓶梅〉中的商人与官吏关系》，王波《〈金瓶梅〉中的明代后期商人、商品和商业经营》，庄丹、胡金望《泰州学派“人欲”观